

引用格式：

罗明忠,陈晓杰,魏滨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J].农业现代化研究,2023,44(3):000-000.
Luo M Z, Chen X J, Wei B H. The impa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on farmers' happiness[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3, 44(3): 000-000.
DOI: 10.13872/j.1000-0275.2023.0036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

罗明忠^{1,2}, 陈晓杰¹, 魏滨辉^{1*}

(1.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 510642; 2.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 乡村振兴实验室, 广东广州 510642)

摘要: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新形势的必然选择, 更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基于集体行动视角, 利用 2016—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CLDS), 运用双重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 分析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并进一步检验村庄特征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 相较感到比较幸福或非常幸福的农民, 仍有 35.6% 的农民感到不幸福。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农民幸福感, 这一结论通过了工具变量法等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来增强农民幸福感。进一步分析发现, 处于中西部地区、民主水平越高、拥有大学生村官和村主任任期越长的村庄,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越明显。据此, 建议应加快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积极倡导乡村民主, 并鼓励村干部任期适当延长。

关键词: 农村集体经济; 农民幸福感; 基础设施建设; 生态环境质量; 村庄特征

中图分类号: F321.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75 (2023) 00-0000-00

The impa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on farmers' happiness

LUO Ming-zhong^{1,2}, CHEN Xiao-jie¹, WEI Bin-hui¹

(1.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China; 2. Rural Revitalization Laboratory, Key Laborato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it is also the way to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farmers' common prosperity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collective action perspective and the 2016-2018 China Labor 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 data,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mpact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farmers' happiness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by the double fixed effect and mediating effect models and examin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village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to farmers who are relatively or very happy, 35.6% of farmers still feel unhappy. The finding that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tributes to farmers' happiness passes endogeneity and robustness tests by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approach.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mainly contributes to farmers' happiness by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villag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ith higher levels of democracy and longer tenures of university student village officials and village chiefs, had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farmers' happines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actively promoting rural democracy, and encouraging the tenure extension of village officials.

Key word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farmers' happiness;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village features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9ZDA115);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20GZYB34)。

作者简介: 罗明忠 (1969—), 男, 江西永新人, 博士, 教授, 主要从事农业经济、劳动经济研究, E-mail: luomingzhong@scau.edu.cn; 通信作者:

魏滨辉 (1995—), 男, 广东梅州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农村经济研究, E-mail: weibinhui577@163.com。

收稿日期: 2023-03-15; 接受日期: 2023-04-08

Foundation item: Major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19ZDA115); Guangzhou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Project (2020GZYB34).

Corresponding author: WEI Bin-hui, E-mail: weibinhui577@163.com.

Received 15 March, 2023; **Accepted** 8 April, 2023

为人民谋幸福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村集体经济是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引领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依托，其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事实上，农村集体经济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做好“三农”工作的重点方向。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以来，农村集体经济从计划经济的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创新制度设计，激发出了不懈活力。农村集体经济不仅在中国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对农民持续增收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有重要贡献^[2-3]。在 2021 年底新一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之后，农村集体经济更是进一步发展壮大。全国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达到 6 685 亿元，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坐拥庞大体量，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力量。然而，现阶段农村集体经济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存在区域资产分布不均衡、乡村人才凋零和干部腐败不作为等问题，导致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村域差异。时势适然，有必要进一步充分释放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红利，以求实现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富裕”。因此，探究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及了解村庄特征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对于下一阶段高质量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推进乡村振兴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既往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研究，主要从影响因素、发展路径和实际作用等方面展开分析。基本共识是，新时期，自上而下推动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助于明晰产权界定，形成产权正向激励机制，并通过唤醒“沉睡”的农村集体资源，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创造了制度前提^[4-5]。同时，厂房、设备等物质资本和山林、土地等自然资源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根源，农村集体现有资源资产的存量决定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起点^[6]，而能人带领作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条件，能够协调各方利益主体实现良性互动，有效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7]。例如，大学生村官的引进能够明显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8]。从发展路径看，无论是以政府财政补助为主的项目式农村集体经济，还是自上而下型的“村企合作”农村集体经济，政府干预都会面临着结构性困境，导致农村集体经济得不到实质性发展，未来还应着重完善经营模式和治理体系^[9-10]。但是，作为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质基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不但有助于增进农民物质富裕，还可以促进村庄公共服务供

给、生态环境改善和文明乡风建设，进而推动农民实现精神富裕^[11-12]。

关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两个方面^[13]。经济因素主要包括收入、税收和政府财政支出等，其中关于收入的讨论尤为广泛。Easterlin^[14]在对国民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时，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即幸福感不一定与收入水平同步增长。此后，围绕“中国是否也存在‘伊斯特林’悖论”这一议题，众多学者从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收入差距等视角做了大量研究，为收入的幸福感效应研究贡献了丰富的中国经验^[15]。非经济因素主要涉及政府质量、公共服务、社会保险和金融科技发展等社会政治因素^[16]以及住房状况、生育数量、子女性别和互联网使用等个人及家庭因素^[13]。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到了政治制度、户籍身份和民主法制等制度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17-18]。

但是，鲜有研究讨论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事实上，国家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全国已建立乡村组三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近 90 万个，清查核实集体账面资产 7.7 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 3.5 万亿元。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规模逐步扩大，发展质量也在稳步提升，这些都将不可避免地对生活及其幸福感产生影响。为此，本文基于集体行动视角，利用 2016—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运用双重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从经济激励和心理激励视角分析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从农村集体经济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视角，探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质量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影响中的作用机制；采用调节效应分析方法，从村庄民主、村庄区域、大学生村干部和村主任任期年限视角考察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影响的村庄特征差异。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立足中国特有的经济组织形式，考察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已有幸福感的研究文献；二是探究村庄民主等村庄特征因素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影响中起到何种调节效应，这对于最大化农村集体经济的幸福感提升效应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作用。

1 理论分析

1.1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

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会对农村居民产

生经济激励。农村集体经济是推动乡村振兴、引领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依托^[5]。尽管中国可能存在“伊斯特林”悖论现象，但是，绝对收入水平的提高仍是促进农民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19]。具体地，农村集体经济能够通过政企合作，促进农村家庭闲置宅基地和承包地的流转，增加农村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影响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进而提高其幸福感^[12]。同时，合作企业还能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和劳动技能培训，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人力资本积累，并拓展农民的社会网络，实现农民幸福感提升^[4, 10]。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经营性收入可用于提取村级公积金和公益金，有助于促进农民幸福感的提升，但也同样压缩了可用于农民分红的部分。此外，由于村集体管理费用等非经营性支出过高，导致可用于分红的集体收入减少，对于农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有限^[20]。

另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会对农村居民形成心理激励。在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中的大多数成员相互之间都是邻居和熟人，平时都有着面对面的接触。对于小集体中的成员而言，成员间的友谊、自尊以及在集体中的声望尤为重要^[21]。相关研究表明，成员之间的信任和交流等心理激励同样会驱使个人参与集体行动^[22-23]。首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改革，明晰农村集体产权，最大限度避免了产权模糊带来的纠纷。而组织成员身份的确认，既要求得到集体中大多数人的认可，也综合考虑了该成员对集体积累的贡献，在确定农民身份权和财产权的同时，也决定了农民是否拥有参与监督集体重大事项决策的权利。由此，加入到集体的农民在参与集体行动时更容易产生自我认同和成就感，形成正向的心理激励，增强其幸福感。其次，不同于国家这类大型集体，中国乡村社会是个熟人之间的社会，村集体更像是一个“友谊集体”，成员间在集体行动中更容易产生共情，并将参与集体行动时获得的尊重、成就感等情感传递给周围的人，进而提升群体的幸福感。最后，农村集体经济的本质之一就是它向成员提供了共同利益，实现了集体收益的分配和共享。为了增进成员间的共同利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努力团结村民共同创业，让农民可以共享集体努力的成果，在分享中共享喜悦，提升自身的幸福感。同时，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加强了农民与村委的交流，能够增强农民的集体归属感，让农民感受到自己真正成了集体的主人，提升农民的参与感和幸福感。综上，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

升农民幸福感。

1.2 基础设施建设的中介作用

在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乡村基层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担着推进乡村公共服务供给、乡村治理建设和发展各项民生福利的重要职责。从农村集体经济的社会属性看，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是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公益性事业投入的重要来源^[9, 20]。现实中，农村集体经济普遍由村委会代理经营，管理机制上的“政经分离”，让农村集体经济更多地追求“共建”，使得集体经济收入将优先投入到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服务支出领域^[10, 20]。可见，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为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经济增长，民生在国民幸福感提升中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16]。在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改善农村民生的重要方面，对于提升农民的福利水平和幸福感有着明显作用。其一，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助于提高农民生产生活的便利度，而且有利于城市公共服务更好地向农村扩散，促进农民就近就地就业和增收，让农民过上更加舒适幸福的生活^[24]。其二，水利设施供给等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明显提升农村农业生产能力，使得农民在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情况下改善农业生产效率，从而显著提升农民幸福感^[25]。其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乡村产业兴旺的前提。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更有利于引进外来投资，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和消费。同时，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农民生活富裕的重要保障，在推动农民外出务工、节约生产成本和改善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26]。因此，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可以通过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间接提升农民幸福感。

1.3 生态环境质量的中介作用

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获得收入后的支出，有很大比例是用于改善村容村貌，保护村庄的生态环境，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11]。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是污水处理、“厕所革命”等公共项目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这些项目的实施，不仅可以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更能改善乡村居住环境，提高农民的健康状况^[20]。由此，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得越好，意味着村里拥有更充实的资金改善村内生态环境质量。而且，在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农村，集体经济主要是通过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生态旅游等环境友好型产业形成特色产业链，能够在无形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当地居民提供优美宜居的生活环境^[10]。此外，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可以发挥整合农村闲置资

源优势, 将集体成员的抛荒耕地或者空房重新流转到集体, 再通过集体“二次流转”到专业大户或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促进撂荒土地的再利用和村庄闲置宅基地的市场化流转, 进而减少资源废弃污染, 改善生态环境^[27]。

另一方面, 居民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满意度将直接关系到生活满意度^[16]。环境污染将通过影响健康状况、降低生活质量和引发不良社会事件, 对幸福感产生绝对剥夺和相对剥夺效应, 而环境治理能有效抑制这种剥夺效应^[28]。此外, 不同于收入增长的社会福利效应会受个体行为能力影响,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具有使用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 能够通过缓解相对贫困, 提升农民的幸福感受^[19]。总之, 改善生态环境, 不仅可以减小环境污染对农村居民健康的不利影响, 还能够缓解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引起的负面情绪, 提升农民的心理健康状况, 增进农民幸福感^[29]。因此,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能够通过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间接提升农民幸福感。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2016—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 CLDS)。该调查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 主要以 15~65 岁的劳动人口为调查对象, 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 在全国 (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 29 个省 (区、市) 展开。数据包含个体、家庭和村居三个模块, 问卷内容较为详尽地囊括了农户个人基本信息、家庭农业生产情况和村庄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 为本文研究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来源。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首先剔除城市的居委会样本, 再将个体、家庭和村居数据相匹配, 然后剔除缺失值样本和不符合现实情况的异常值样本, 如个别村庄集体经济收入超过百亿的样本, 最终得到两期有效样本 7 335 个。

2.2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民幸福感。目前对幸福感的概念界定及其衡量存在诸多

方法, 既有结合收入、健康状况和生活环境等因素进行度量的客观标准, 也有以自我报告的快乐程度或者生活满意度进行衡量的主观标准^[30]。后者便是本文对农民幸福感的定义, 即主观意义上的幸福感。具体地, 该变量的设定基于个体问卷中受访者对“总的来说, 您认为您的生活过得是否幸福?” 这一问题的回答, 用 1~5 分赋值, 分值越大, 表明其幸福感越高。

2)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既往研究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多采用集体经济总收入指标或者将其作对数处理^[12]。此外, 有学者强调,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高低关键在于其实际盈利能力, 遂以人均集体收入或者人均集体经济净收入指标进行度量^[5, 8]。借鉴以上研究, 兼顾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采用人均村庄集体经济收入作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度量, 即村集体经济收入与村庄实际居住人数之比。

3) 中介变量。本文的中介变量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质量。如前文所述, 农村集体经济可以通过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乡村生态环境质量, 间接增强农民幸福感。其中, 基础设施建设变量采用村庄人均基础设施建设支出进行度量, 即村庄财政支出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与村庄实际居住人数之比; 生态环境质量涉及多个方面, 本文借鉴普遍的做法, 结合数据的可得性, 选取绿化覆盖率、退耕还林和土壤改造 3 个指标来衡量生态环境质量。此外, 因各指标的原始属性和量纲量级不同, 无法直接进行加总计算, 所以本文在属性处理上, 对所有逆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 在量纲量级处理上, 先对各指标进行归一标准化处理, 再将处理后的各指标加总计算均值。生态环境质量变量的具体指标构建体系见表 1。

4) 调节变量。本文的调节变量为村庄特征, 主要包括村庄民主、村庄区域、大学生村干部和村主任任期年限。其中, 借鉴陈前恒和职嘉男^[18]的做法, 村庄民主选取村庄村民代表大会每年举办的次数作为衡量指标; 村庄区域根据传统意义上的东部和中西部进行划分, 并生成一个二值变量, 若是

表 1 多维度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体系

Table 1 Multi-dimensional indicator system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指标	定义与度量	均值	标准差
绿化覆盖率	村庄的绿化覆盖率 (%)	55.790	26.684
退耕还林	是否有退耕还林: 是=1; 否=0	0.409	0.492
土壤改造	是否有土壤改造: 是=1; 否=0	0.146	0.353

东部地区，则取 1，否则取 0；根据村主任是否为大学生，将大学生村干部赋值成二值变量，若村主任的学历是大专及以上，则取 1，否则取 0；村主任任期年限指的是村主任上任至今的任职时长。

5) 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13]，本文选取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村庄层面三类控制变量。其中，

个体层面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收入、公平感和养老保险，同时纳入年龄的平方项，检验年龄对农民幸福感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家庭层面包括社会地位、社会信任、邻里互助和邻里关系。村庄层面为村人口密度和村空宅比例。

上述所有变量的定义及其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Table 2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定义与度量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农民幸福感	受访者对生活幸福感的评价：用 1~5 分赋值	3.791	0.884
核心解释变量	农村集体经济	采用人均村庄集体经济收入，即村庄集体经济收入 / 村庄实际居住人数（万元 / 人）	0.850	9.248
中介变量	基础设施建设	采用村人均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的对数形式，即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 村庄实际居住人数（万元 / 人），取对数形式	-3.179	2.888
	生态环境质量	多维度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体系中，3 个指标处理加总后的均值	0.371	0.244
调节变量	村庄民主	村庄村民代表大会每年举办的次数	5.511	5.849
	村庄区域	村庄所处区域是否为东部地区：是 =1；否 =0	0.511	0.500
	大学生村干部	是否上过大学：大专及以上 =1，其它 =0	0.226	0.418
	村主任任期年限	所在村村主任任期年限（年）	6.835	6.325
控制变量	性别	受访者性别：男 =1；女 =0	0.582	0.493
	年龄	受访者年龄（岁）	52.113	12.485
	年龄平方	年龄平方 / 100	28.716	12.899
	婚姻状况	受访者婚姻状况：未婚和同居 =0；初婚和再婚 =1，删去离异和丧偶样本	0.916	0.278
	个人收入	受访者去年的总收入（元），取对数	9.957	0.891
	公平感	受访者认为目前的生活水平和在工作上的努力比起来是否公平：用 1~5 分赋值	3.310	0.925
	养老保险	受访者是否有养老保险：是 =1；否 =0	0.632	0.482
	社会地位	受访者对目前社会地位等级的评价：用 1~10 分赋值	4.408	1.712
	社会信任	受访者是否同意大多数人是可信的：用 1~5 分赋值	2.867	0.538
	邻里互助	受访者与社区邻里街坊的互助情况：用 1~5 分赋值	3.585	0.956
	邻里关系	受访者与社区邻里街坊的熟悉程度：用 1~5 分赋值	4.057	0.867
	村人口密度	村庄行政总面积 / 村实际居住人数（km ² / 人）	0.005	0.016
	村空宅比例	村庄平时无人居住的住房占全部住房的比例（%）	12.894	15.640

注：表中赋值变量的分值越大，表明程度越高。

2.3 模型设定

1) 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为：

$$H_{it} = \beta_0 + \beta_1 R_{ijt} + \beta_c X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中： H_{it} 代表农民幸福感，即个体 i 在 t 时期的幸福感水平， R_{ijt} 代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即个体 i 所在村庄 j 在时期 t 的人均集体经济收入， X_{it} 代表影响农民幸福感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个人、家庭和村庄层面的变量， β_0 为常数项， β_1 和 β_c 为系数估计值， μ_i 为个体 i 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 δ_t 则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此外，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模型的异方差性，本文在进行模型估计时在省份层面对标准误进行聚类。

2) 中介效应模型。为检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影响农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判断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质量是否为本文的

中介机制，模型设定为：

$$M_{ijt} = \alpha_0 + \alpha_1 R_{ijt} + \alpha_c X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H_{it} = \rho_0 + \rho_1 R_{ijt} + \rho_2 M_{ijt} + \rho_c X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式中： M_{ijt} 为中介变量，分别代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α_0 和 ρ_0 为常数项， α_1 、 α_c 、 ρ_1 、 ρ_2 和 ρ_c 为系数估计值。

2.4 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由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越好的村庄往往有着更大的发展潜力，且拥有更丰富的资产资源和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甚至是明确的政策倾向，生活在此类型村庄的农民往往也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自身幸福感也就越高，决定本文的研究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此外，虽然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农民幸福感之间的联立因果关系看起来并不明显，但是现实中难以避免存在无法观察的因素或者部分不为人所知的重要因素，导致本文的研究还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选取该村距所属

乡镇政府的距离（取对数）与该省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平均值的交互项作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工具变量。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根据区位理论，在若干区域内，个别区域由于地理位置或者行政职能会率先发展成为“中心”，其它区域则发展为“外围”，依附于中心。乡镇政府所在的行政村是所辖区域的中心村，其历史选定基于该村在人口规模、地理位置和交通等因素较其它村庄占据优势。因此，中心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经济活动集聚度也都超过其它村庄，与上级政府的联系也更紧密，拥有更大的潜力发展集体经济。由于距离产生成本，较近的区位间经济联系越强。当村庄距离所属乡镇政府越远，经济活跃程度、交通基础和人口集聚水平逐步弱化，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更弱。所以，村庄距所属乡镇政府的距离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呈负相关关系，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条件。其次，该村距所属乡镇政府的距离是一个相对外生变量，与农民幸福感无直接关系，即村庄到所属乡镇政府的距离并不会直接影响农民幸福感，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条件。最后，由于村庄距所属乡镇政府的距离不随时间变化，借鉴李红锦和张丁山^[31]的做法，将该距离变量与该省每年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平均值相乘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

为进一步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可靠，本文采用四种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更换被解释变量定义，将幸福感设定为二分类变量，具体地，若受访者回答的幸福感分数达到 1~3 分，则该变量取值为 0，否则取值为 1；二是删除部分样本，考虑到直辖市的区位优势 and 自治区治理机制的独特性，本文在排除这些地区的样本后重新进行估计；三是变更模型设定，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往往有着更高的市场化程度以及对人才和资本更强的集聚效应，农村集体经济进而会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对此，为缓解这一宏观环境因素变化对回归

结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加入省份固定效应、省份与年份交互效应进行估计；四是改变估计模型，由于农民幸福感是一个排序离散变量，通过建立一个有序 Probit 模型重新进行估计，但此时若只控制年份固定效应，有可能遇到遗漏变量问题，所以进一步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及其与年份交互效应。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农民幸福感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农民幸福感均值为 3.791（表 2）。一方面，考虑到认为自己非常不幸福和比较不幸福的农民样本较少，将其与幸福感处于一般水平的样本合并，重新定义为不幸福，并将认为自己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样本合并，定义为幸福。结果显示，认为自己幸福的农民占比 64.4%（表 3），表明全样本中有超半数以上的农民处于较为幸福状态，有 35.6% 的农民感到不幸福，说明农民的幸福水平提升还存在不小的空间。观察处于不同幸福感状态的农民所对应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发现感到幸福的农民处于更高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另一方面，2017 年全国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为 4 627.6 亿元，确认集体成员近 1 亿人，人均集体收入接近 0.5 万元，为此，本文将 0.5 万元/人作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第一分界点。同时，陆雷和赵黎^[20]的研究指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强村”的经营收益约是平均水平的 10 倍，故本文将 5 万元/人作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第二分界点，以此来比较不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下农民幸福感的差异。结果显示，随着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民幸福感也在不断提升（表 3）。上述结果初步表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可能与农民幸福感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农村集体产权进一步明晰，乡村“沉睡”的集体资源蜕变为“活”资产，有助于实现政—企—村三方合作，

表 3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民幸福感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level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armers' well-being

主观幸福感	样本	比例 (%)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不幸福	2 608	35.556	0.639
幸福	4 727	64.444	0.966
总体	7 335	100	0.850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万元/人)	样本	均值 (万元/人)	主观幸福感
≤ 0.5	6917	0.031	3.788
(0.5, 1]	146	0.630	3.877
(1, 5]	105	2.803	3.924
> 5	167	33.738	3.760
总体	7 335	0.850	3.791

促进农村形成特色产业，给当地农民的生活质量带来明显提升，进而增进农民幸福感。特别是在现代交通发达、农村剩余年轻劳动力城乡流动频繁的背景下，乡村土地撂荒和宅基地闲置现象明显，而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促进该类型土地的流转，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还能对乡村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治理做出突出贡献。

需要特别说明的两点是：第一，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 0~0.5 万元/人的样本占比较高，这是因为目前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空壳村”和“薄弱村”普遍存在。《中国农业统计资料》和《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数据显示，2016—2018 年无集体经营性收入的村庄数量占比分别为 51.5%、46.5% 和 35.8%，而集体经营性收入在 0~5 万元的村庄数量占比则分别为 23.4%、24.3% 和 27.9%。可见，中国村域集体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不平衡，低发展水平占比大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第二，当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 5 万元/人以上的时候，农民的幸福有所下降，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初期的收入效应和公共效应是处于递增状态的，但随着其不断发展壮大，相比原始资本匮乏的弱势农民群体，拥有初始资本积累的乡村精英可能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从而在不同群体间形成一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导致农民整体幸福感没有明显提升，甚至出现下降趋势，表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也可能存在“幸福—收入”悖论。

3.2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在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前后，农村集体经济学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表 4），说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幸福感。观察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可知，在其它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相比女性，农村男性的幸福感更高，收入、公平感、社会地位、社会信任、邻里关系等控制变量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征这些因素的改善均能够增进农民的幸福。年龄对农民幸福感呈 U 型影响，这与罗必良等^[19]、罗明忠和刘子玉^[13]的研究结论类似。此外，初婚或者再婚、拥有养老保险和邻里互助较少的农民幸福感更高，人口密度和空宅比例越高的村庄，农民幸福感越高。可能的原因在于，夫妻能给彼此提供情感和健康生活提醒等支持，这与大多心理学研究观点“已婚群体比单身群体更幸福、更健康”相一致。拥有养老保险的群体对未来更有安全感，而较少的邻里互助则代表着不频繁的人际关系维护，这些都能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提升作用。

3.3 内生性检验分析

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显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表 4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影响的基准回归

Table 4 Benchmark regression of the impacts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on farmers' happiness

变量	无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农村集体经济	0.005***	0.001	0.005***	0.002
性别			0.773***	0.154
年龄			-0.145	0.131
年龄的平方			0.002	0.001
婚姻状况			0.212	0.125
收入			0.062***	0.022
公平感			0.123***	0.034
养老保险			0.085	0.084
社会地位			0.057***	0.017
社会信任			0.194***	0.067
邻里互助			-0.014	0.034
邻里关系			0.135***	0.034
村人口密度			1.394	3.655
村空宅比例			0.004	0.003
常数项	3.785***	0.026	3.817	3.330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 335		7 335
R ²		0.002		0.087

注：***、**、*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标准误为省份层面的聚类标准误（下同）。

的工具变量系数符号为负,并通过 1% 的显著性检验(表 5),表示该村距所属乡镇政府的距离越远,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越差。同时,第一阶段的 F 值大于临界值 10,证明该变量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即本文所选工具变量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之间

是强相关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系数符号为正,并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确实能够提高农民幸福感,上述结果再次验证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表 5 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Table 5 Test results of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该村距所属乡镇政府的距离 × 该省农村集体经济收入 农村集体经济	-0.855***	0.211	0.011**	0.005
常数项	4.973***	1.903	2.633***	0.29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 253	7 253	7 253	7 253
R ²	0.127	0.171	0.171	0.171
F 值	16.472***			

注:上述样本量有所减少,是因为删减了缺失值。此外,为了弱化省际差异引起的内生性,这里加入了省份固定效应、省份与年份交互效应。

3.4 稳健性检验分析

稳健性估计结果显示,在更换被解释变量定义之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仍显著为正,并通过 5% 的显著性检验(表 6);排除直辖市和自治区样本后重新进行估计,农村集体经济系数为 0.005,并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非常接近,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并不由超大型城市和经济基础相对落后地区城市所驱动;考虑到宏观环境因素变化带来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及其与年份交互效应,此时,变更模型设定后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系数为 0.006,并通过 1%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农民幸福感;根据被解释变量特征,本文改变估计模型重新进行估计,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仍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幸福感。因而,本文的估计结果

具有稳健性。

3.5 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村庄民主、村庄区域、大学生村干部和村主任任期年限视角,引入这些特征及其与农村集体经济的交互项,进一步探究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影响的群体特征,以了解农村集体经济的集体优越性和包容性。此外,为了避免共线性问题,本文对核心解释变量和连续型调节变量均进行均值中心化处理。

1) 村庄民主。估计结果显示,民主程度越高的村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提升幅度更大(表 7),说明有农民直接参与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更加能够增强农民的幸福。可能的原因在于,现代农民越来越注重在集体中的话语权,民主程度越高的村庄,农民的幸福越高^[30]。农民在参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6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变量	更换被解释变量		删除样本		变更模型设定		改变估计模型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农村集体经济	0.003**	0.002	0.005***	0.002	0.006***	0.002	0.003**	0.00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	\	\	\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 年份	\	\	\	\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 335	6 292	7 335	6 292	7 335	7 335	7 335	7 335
R ²	0.051	0.105	0.105	0.125	0.125	0.125	0.078	0.078

表 7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Table 7 Adjustment effect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农民幸福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农村集体经济	-0.006	0.004	0.005***	0.001	0.005***	0.002	0.009***	0.001
村庄民主	0.001	0.046						
村庄民主 × 农村集体经济	0.002***	0.004						
村庄区域 × 农村集体经济			-0.001**	0.001				
大学生村干部					1.358 ***	0.363		
大学生村干部 × 农村集体经济					1.510 ***	0.512		
村主任任期							0.016***	0.003
村主任任期 × 农村集体经济							0.004**	0.0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 311		7 335		7 335		7 335	
R ²	0.089		0.088		0.095		0.097	

注：将虚拟变量是否为东部地区放入回归模型 2 中，会被固定效应模型吸收掉，故并未列出。

与村庄事务决策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发出自己内心的声音，让自身需求得到倾听，激发自身的集体归属感，还能够增强与村两委的交流，对村干部形成有效监督，使得村庄承接的政府公共项目对准农民实实在在的需求，进而提升农民幸福感^[18]。

2) 村庄区域。本文划分了传统意义上的东部、中西部样本，以考察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差异。估计结果表明，相比中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更小（表 7）。这一结论与孔祥智^[32]的调研发现相似，即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获得的实惠更多。相比经济发展迅速的东部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农民幸福感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体现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包容性。

3) 大学生村干部和村主任任期。估计结果表明，大学生村干部与农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在拥有大学生村干部的村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促进效果越大（表 7）。可能的原因是，村干部的文化素养是影响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33]，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要求相关负责人具备市场化经营运作能力，而大学生村官不仅具有较强的市场信息获取能力，有利于引进外部投资，使得集体农产品适销对路，而且与上级政府关联更加密切，能够及时获取和精准实行扶农政策，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的福利^[8]。村主任任期越长，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给农民带来的幸福感越高，说明在目前的村主任任期制下，村主任任期限越长的村庄，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越能提升农民的幸福感和。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受村干部任期短的影响，领导班子频繁更迭，带来的结果就是政策目标的不稳定和村干部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突出。反之，村干部任期适度延长，积累的社会资本和知识经验就越多，对村庄管理更为熟悉，在村里的权威和关系网络更加强固^[34]，更有利于组织农民参与农村集体经济，减少村民在参与集体行动时发生冲突摩擦。因此，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给农民带来的幸福感效应更强。

3.6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影响机制分析

根据理论分析，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可能通过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乡村生态环境质量，进而提升农民幸福感。因此，本文使用中介效应模型的逐步回归法对上述作用机制进行检验。

基础设施建设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回归系数为正，并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 8），说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回归系数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有助于增大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在将基础设施建设变量加入到基准回归模型后，其回归系数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示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增进农民的幸福感和，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系数相比基准回归有

表 8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8 Mediation effect test results

变量名称	农民幸福感		基础设施建设		农民幸福感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农村集体经济 基础设施建设	0.007***	0.002	0.048***	0.008	0.006***	0.002
					0.023***	0.00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6 996		6 996		6 996	
R ²	0.085		0.106		0.092	

变量名称	农民幸福感		生态环境质量		农民幸福感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农村集体经济 生态环境质量	0.005***	0.002	0.002***	0.001	0.004**	0.002
					0.346**	0.16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 335		7 335		7 335	
R ²	0.087		0.042		0.098	

注：上述样本量有所减少，是因为删减了缺失值。

所下降，说明基础设施建设的确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幸福感提升的作用机制之一。

生态环境质量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生态环境质量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作回归的系数为正，并通过 1%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有利于促进村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在将生态环境质量加入到基准回归模型后，其回归系数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生态环境质量对农民幸福感具有正向效应，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影响农民幸福感的效应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同样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系数相比基准回归系数有所下降，表明促进生态环境改善确实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升农民幸福感的机制之一。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研究表明，农民幸福感均值为 3.791，有超半数以上的农民处于较为幸福状态，但仍有 35.6% 的农民感到不幸福，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提升还存在不小的空间。当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高位，农民的幸福水平更高。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确实能够提升农民幸福感。具体而言，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提升效应主要是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生态环境来实现。然而，该影响效应应具有村庄特征差异。调节效应回归结果显示，相较东部

地区，中西部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正向促进效应明显增强，说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对于中西部农民生活幸福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此外，民主水平、大学生村干部和村主任任期年限在该效应中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这意味着提升村庄民主水平、引进高素质人才和在任期制条件下适当延长村干部任期，将有利于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促进效应。

本研究从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视角，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幸福感提升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但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的收入效应未作探究，之后有待利用更为详尽的数据，对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机制的有效性进行研究。

4.2 启示

根据上述结论，下一阶段提升农民幸福感应着重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和促进民主建设等方面入手。

1) 加快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应充分释放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政策红利，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进一步盘活农村集体资产，建立健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机制，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同时，要健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利益分配的激励相容机制，进一步调动乡村精英投身农村集体经济的积极性。既要克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问题，又要避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可能发生的“精

英俘获”难题，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2) 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有利于对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引进农业技术，而且有助于缓解相对贫困带来的幸福感差距。因此，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应积极完善乡村公共服务建设体系和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比如实行统一灌溉排水和提供机耕服务等支农措施，或者提供建设公共环卫设施、老年人活动中心和公园广场等惠民服务，以此丰富农民农业生产手段和日常休闲娱乐生活。

3) 倡导乡村民主，在坚持任期制前提下适当延长村干部任期。要加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信息和政务信息的披露强度，通过召集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集体事项的决策授权，充分尊重农民的参与意愿，塑造农民的主人翁意识，提升农民参与集体经济过程中的话语权。同时，应积极鼓励农村基层干部任期适当延长，为村干部做好乡村发展长期规划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从而减少村干部的功利主义行为和机会主义倾向行为，实现集体资产收益在成员之间的公平分配，保证农村建设事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致谢：特别感谢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库的支持。

参考文献：

- [1] 胡凌啸, 周力. 农村集体经济的减贫效应及作用机制——基于对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的评估 [J]. 农村经济, 2021(11): 1-9.
Hu L X, Zhou L.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and function mechanism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J]. Rural Economy, 2021(11): 1-9.
- [2] 丁忠兵, 苑鹏.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促进共同富裕的贡献研究 [J]. 农村经济, 2022(5): 1-10.
Ding Z B, Yuan P. Study on the contribu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the promo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J]. Rural Economy, 2022(5): 1-10.
- [3] 罗明忠, 魏滨辉.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县域城乡收入差距 [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21(6): 78-90.
Luo M Z, Wei B H.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and county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2, 21(6): 78-90.
- [4] 张应良, 徐亚东. 农村“三变”改革与集体经济增长：理论逻辑与实践启示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9(5): 8-18.
Zhang Y L, Xu Y D. Rural “three changes” reform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growth: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9(5): 8-18.
- [5] 芦千文, 杨义武.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否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3): 84-103.
Luo Q W, Yang Y W. Can the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2(3): 84-103.
- [6] 李韬, 陈丽红, 杜晨玮, 等. 农村集体经济壮大的障碍、成因与建议——以陕西省为例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2): 54-64.
Li T, Chen L H, Du C W, et al. Obstacles, caus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growth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Evidence from Shaanxi Province[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1(2): 54-64.
- [7] 罗琦, 唐超, 罗明忠. 村治能人推进农村集体产权改革：逻辑分析与案例解剖——基于安徽省夏刘寨村的调查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6): 86-92, 155-156.
Luo Q, Tang C, Luo M Z. Rural able-person promotes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reform: Logic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y—Based on the survey of Xia Liu Zhai village in Anhui Province[J].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8(6): 86-92, 155-156.
- [8] 张洪振, 任天驰, 杨纳华. 大学生村官推动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吗？——基于中国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 [J]. 中国农村观察, 2020(6): 102-121.
Zhang H Z, Ren T C, Yang R H. Did college student village official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An analysis based on data from China's third agricultural census[J]. China Rural Survey, 2020(6): 102-121.
- [9] 袁梦. 乡村振兴中的项目式集体经济：实践探索与发展定位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22(4): 69-78.
Yuan M. Village management behavior under the path of project-based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2, 22(4): 69-78.
- [10] 丁文, 程子扬. “村企合作”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完善——基于鄂西北 H 村的个案研究 [J]. 河北法学, 2022, 40(9): 62-79.
Ding W, Cheng Z Y.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the mode of “village-enterprise” cooperation—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H village in northwest Hubei province[J]. Hebei Law Science, 2022, 40(9): 62-79.
- [11] 李人庆, 芦千文. 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基于山东即墨鳌角石村案例研究 [J]. 当代经济管理, 2022, 44(11): 1-8.
Li R Q, Lu Q W. 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promoting farmers' common prosperity—A case study based on Aojiaoshi village, Jimo district, Shandong province[J]. Contemporary Economic Management, 2022, 44(11): 1-8.
- [12] 孙雪峰, 张凡. 农村集体经济的富民效应研究——基于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双重视角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22(6): 183-194.
Sun X F, Zhang F. Study on the enrichment effec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physical and spiritual affluence[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2, 22(6): 183-194.
- [13] 罗明忠, 刘子玉. 互联网使用、阶层认同与农村居民幸福感 [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8): 114-131.
Luo M Z, Liu Z Y. Internet use, class identity and rural residents' well-being[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2(8): 114-131.
- [14] Easterlin R A. 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 happiness of all?[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95, 27(1): 35-47.
- [15] 李路路, 石磊. 经济增长与幸福感——解析伊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J]. *社会学研究*, 2017, 32(3): 95-120, 244.
Li L L, Shi L. Economic grow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nalyzing the formative mechanism of Easterlin Paradox[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7, 32(3): 95-120, 244.
- [16] 周绍杰, 王洪川, 苏杨. 中国人如何能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调查[J]. *管理世界*, 2015(6): 8-21.
Zhou S J, Wang H C, Su Y. How Chinese people can have a higher level of happiness—Based on China's livelihood index surve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5(6): 8-21.
- [17] Frey B S, Stutzer A. Happiness and economics: How the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affect well-being[J].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003, 159(2): 435-436.
- [18] 陈前恒, 职嘉男. 村庄直接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J]. *中国农村观察*, 2014(6): 59-70, 95-96.
Chen Q H, Zhi J N. Impact of village's direct democracy on farmers' happiness[J]. *China Rural Survey*, 2014(6): 59-70, 95-96.
- [19] 罗必良, 洪炜杰, 耿鹏鹏, 等. 赋权、强能、包容: 在相对贫困治理中增进农民幸福感[J]. *管理世界*, 2021, 37(10): 166-181, 240, 182.
Luo B L, Hong W J, Geng P P, et al. Empowering people, strengthening capacity and ensuring inclusiveness: Enhancing farm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reducing relative povert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1, 37(10): 166-181, 240, 182.
- [20] 陆雷, 赵黎. 共同富裕视阈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分配问题[J]. *当代经济管理*, 2022, 44(10): 1-8.
Lu L, Zhao L. Income distribu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J]. *Contemporary Economic Management*, 2022, 44(10): 1-8.
- [21] Olson M.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22] Dawes R M, Mctavish J, Shaklee H. Behavior, communication, and assumptions about other people's behavior in a commons dilemma situatio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7, 35(1): 1-11.
- [23] Anderson L R, Mellor J M, Milyo J. Social capital and contributions in a public-goods experi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2): 373-376.
- [24] 魏后凯, 姜长云, 孔祥智, 等.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权威专家深度解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J]. *中国农村经济*, 2021(1): 2-14.
Wei H K, Jiang C Y, Kong X Z, et al. Pushing forwar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ll all-round way: An in-depth interpretation by authoritative experts of the spirit of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1(1): 2-14.
- [25] 王兵, 杨宝. 村庄公共支出规模、结构和农民幸福感[J]. *中国行政管理*, 2018(2): 53-57, 70.
Wang B, Yang B.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village public expenditure and peasants' subjective well-being[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8(2): 53-57, 70.
- [26] 曾福生, 蔡保忠. 农村基础设施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7): 88-95.
Zeng F S, Cai B Z. Rural infrastructure is the basis of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8(7): 88-95.
- [27] 郭晓鸣, 张耀文.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逻辑、领域拓展及动能强化[J]. *经济纵横*, 2022(4): 87-95.
Guo X M, Zhang Y W. Development logic, field expansion and momentum strengthening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J].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2022(4): 87-95.
- [28] 李梦洁. 环境污染、政府规制与居民幸福感——基于 CGSS (2008) 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 2015, 37(5): 59-68, 126.
Li M 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the happiness sense of residen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GSS (2008) micro-survey data[J]. *Modern Economic Science*, 2015, 37(5): 59-68, 126.
- [29] 郑沃林, 洪炜杰, 罗必良. 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增进农民幸福感——基于经济收入-社会网络-生态环境框架的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6): 140-151.
Zheng W L, Hong W J, Luo B L. Enhancing farmers' happiness in common prosperity: Analysis based on economic income-social network-ecological welfare framework[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1, 21(6): 140-151.
- [30] 罗明忠, 陈伟漫, 林玉婵. 民主参与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社会公平感知的调节效应[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 110-122, 207.
Luo M Z, Chen W M, Lin Y C. The effect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on rural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social equity[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2(4): 110-122, 207.
- [31] 李红锦, 张丁山.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影响研究[J]. *金融经济研究*, 2022, 37(3): 146-160.
Li H J, Zhang D S.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ural-urban integration[J]. *Financial Economics Research*, 2022, 37(3): 146-160.
- [32] 孔祥智. 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于“产权清晰+制度激励”理论框架的研究[J]. *经济纵横*, 2020(7): 32-41, 2.
Kong, X Z.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The research based on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roperty rights clarity plus institution incentive”[J].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2020(7): 32-41, 2.
- [33] 赵仁杰, 何爱平. 村干部素质、基层民主与农民收入——基于 CHIPS 的实证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 2016(2): 129-152.
Zhao R J, He A P. Village cadres quality, village democracy and farmers' incom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PS data[J]. *Nankai Economic Studies*, 2016(2): 129-152.
- [34] 杨婵, 贺小刚. 村长权威与村落发展——基于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分析[J]. *管理世界*, 2019, 35(4): 90-108, 195-196.
Yang C, He X G. Authority of village chiefs and the rural development: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TVS dat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9, 35(4): 90-108, 195-196.